

【历史研究】

汉代循吏与孝思想的传播

王晓晖

韩国河

摘要: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多数基层官吏都能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一政策,尤其循吏,在传播孝行思想方面贡献尤多,他们一是身体力行,亲为表率,以榜样的作用进行传播;二是建立学校,广施教育,以宣传的形式进行传播。循吏对孝思想的传播效果可以从近年来出土墓葬中的孝行图、鸬杖图等装饰图像中得到印证。

关键词:汉代;循吏;孝行;孝思想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5-0125-04

循吏是汉代官僚群体中的特殊类型,“在正史《循吏传》外,尚能在不少士大夫身上看到循吏的影子”^①。从积极意义的角度来看,循吏在推行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传播“孝思想”、推广“孝伦理”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对保障政权稳定、淳化乡里风俗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学界对汉代孝行思想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代孝文化、孝伦理、孝思想与国家治理方面,^②对循吏在孝思想传播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拟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对汉代循吏^③在孝思想传播方面的作用略作探讨。

一、汉代孝思想的形成和传播

孝思想来自于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且是“鬼魂崇拜中特别发达的一种”^④。《诗经》中有27篇诗文与孝道或孝思想有关^⑤,如“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母氏圣善,我无令人”^⑥等。《周易·萃卦》亦有“王假有庙,致孝享也”^⑦。《毛公旅方鼎》铭文则有“飨其用脩,亦引为孝”^⑧。西周金文中关于“孝”的内容多达16种,如“孝”“永孝”“卿孝”^⑨等,其中“孝”的对象为祖先、父母、宗室、大宗、宗庙、宗老以及兄弟、朋友和有婚姻关系的亲属、诸侯等。《荀子》载:“能以事亲谓之孝。”^⑩《礼记·祭

统》曰:“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⑪《尚书·尧典》载:“克谐以孝。”^⑫《吕氏春秋·孝行览》说:“务本莫贵于孝。”^⑬郭店楚简中《六德篇》称:“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悌。”^⑭这些文献记载说明了“孝”自先秦时期就被提升到较高的伦理道德层面,汉代统治者继承了这一思想。

1. 汉代孝思想的形成

汉代孝思想被定为国策,其形成有一个过程。汉初,统治者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重新认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汉武帝时期,肯定了道德教化之于政权巩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以“孝”为纽带,维护家庭、家族、乡里社会乃至王权利益。汉代“以孝治天下”是以血缘关系比拟政治关系并渗透其中的关键。董仲舒是汉代第一个把孝道提高到首要地位的人,他认为父子之孝可以取法天地。^⑮汉代选官制度中特别突出孝廉^⑯,如东汉中的雁门太守鲜于璜,其墓碑文便有“君察孝,除郎中”^⑰的记载。汉代“三老”则以其“德高望重的长者身份,以维护血缘家族宗法制的‘孝’的思想为中心对‘民众’进行教诲”,目的是为了辅助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⑱汉代所建立的“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是我国封

收稿日期:2022-03-07

作者简介:王晓晖,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郑州 450003)。

韩国河,男,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教授(郑州 450003)。

建社会秩序的雏形”^{①9}。汉代的“孝”与先秦时期“孝”的对象的不同之处在于,“孝奉母亲”^{②0}也成为孝道的重要内容,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孝敬父亲。汉代推进孝治的主要做法有“以孝作谥、优待孝子、选拔官吏、诵读《孝经》等”^{②1}。汉代大臣在奏疏中将《春秋》与《孝经》并引,作为政治上的依据和思想上的准绳,“成为汉代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两大精神支柱”^{②2}。汉初的“孝治”主要体现在“导民向孝”和树立起“为民父母”的形象两个方面^{②3}。《孝经》是将事父之孝升华为事君以忠、家国一体的伦理节点,是将忠与孝结合起来的一部重要经典。^{②4}汉代的孝已经从家庭道德扩大至政治、社会等方面,并成为封建纲常,孝伦理亦出现了“政治化、社会化、强制化、神秘化、泛化”^{②5}等异化现象。

2. 汉代孝思想的传播和推广

秦汉以来,国家政令的宣传和推广,多依靠刻石和粉壁,这是基层统治机构传达“治国政策、官府政令的重要工具”^{②6},当然也是普通民众了解国家政令的重要信息渠道。国家政令和思想伦理通过理论构想、制度安排和实际运行,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了一套易于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汉代孝思想的传播来自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倡导,如汉武帝于元光元年(前 134)下诏:“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②7}建立举孝廉制度,使察举制度成为正统的政治制度^{②8},必定使孝思想得到极大的推动和广泛的传播。

除了诏书之外,国家政令和伦理思想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将体现皇权意志的思想观念、道德要求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孝思想传播方面,政府通过表彰孝悌力田者、推选三老行教化、举孝廉以入仕、对高年赐以王杖、褒扬孝子、推广《孝经》等方式来广泛传播孝行思想,以达到大兴孝治的目的。如“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②9}、“二年冬,赐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③0}等。同时,政府还注重利用诏书、律令、制度以及祭祀等多种形式强化民众孝的观念。对于不孝行为,则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惩治,以此方式来更广泛地传播孝行理念。如“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③1}。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和传播,“孝思想”成为汉代主要的治国理念。

二、汉代循吏对孝思想的传播

汉代“亲亲、尊尊、贤贤及乐生”的精神“为循吏

所执守并导民于礼俗之中”^{③2}。汉代循吏承担了更多教化、爱民的角色,在实际中也就占据了传播汉代孝思想的主体地位。在政令统一、社会稳定的有利条件下,循吏通过教育、教化把孝思想广泛传播到汉代中央政府所辖的各个区域,如汉宣帝时期韩延寿表彰“孝弟有行”者,并“以此劝化民风”。^{③3}汉代地方官员有教化之责,而循吏比一般官吏更忠于职守,对国家政策的推行不遗余力,严谨认真。

1. 文献记载中的循吏对孝思想的传播

司马迁认为循吏应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③4}者,《汉书·循吏列传》记载了文翁、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循吏,他们的行为具备循吏“仁爱好教化”“安抚百姓、安置流民”“存问耆老孤寡”“为人忠厚、刚正有大节”^{③5}的特点,如黄霸治理颍川八年,“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事鰥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③6},孝悌之行日益众多,反映出黄霸对孝思想传播的成效。再如秦彭,“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③7}。许荆担任桂阳太守期间,感化蒋均兄弟,致其感悟兄弟恭之道。^{③8}仇览在担任蒲亭长一职时,亲赴陈元家中感化母子二人并使“元卒成孝子”^{③9}。他们都以实际行动传播了孝思想和孝伦理。

2. 碑文所载循吏对孝思想的传播

碑文中记载循吏对孝思想传播的事例也被记录下来。如《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载,景君担任北海相时期,“鸱枭不鸣,分子还养”,即使“已分家之子也还家养亲”。^{④0}说明其在传播孝行思想、推行孝行实践中取得了相当好的教化效果。《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是“目前所见唯一在碑文中明称碑主为‘循吏’的两汉碑刻”。碑文中记载鲁峻亲身示范,传播孝思想的事迹,即碑文中所说的“丧父如礼”。^{④1}再如《汉故山阳太守祝君之碑》,碑文中有“州郡以孝贡察”^{④2}的记录,为祝睦立碑之人颂扬其德行事迹,主要是因为祝睦自身对孝道的力行与传播。此类碑文的主人,在生前大多担任太守或县令(长)等郡县主官,多以孝行举孝廉入仕,他们勤于职守、倡导孝行,故被长吏赞为“循吏”,或被后人以循吏比侔。尽管有些碑文主人并未为正史所记载,且其碑文中所描述的从政事迹甚或有言过其实、夸大溢美之嫌,然而通过碑文描述,至少我们可以一窥汉代循吏在孝行思想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付出

的努力。

三、汉代循吏对孝思想传播的效果

汉代循吏对孝行思想的传播效果可以从墓葬装饰中反映出来。反映孝思想和孝伦理图像的墓葬及建筑,包含了刻绘有孝子图像和鸠杖敬老图像的墓葬、祠堂、石阙等,这些图画用以装饰和教化后人^⑬,传播孝思想孝伦理的意图明显。如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⑭,其墓主人为武梁、武开明、武班、武荣,其中,武梁碑有“体德忠孝”^⑮的记载,而武班碑中亦有称誉其为“忠臣”“孝友”^⑯的文字。武氏祠刻绘有老莱子娱亲、闵子骞失捶、邢渠哺父等数量众多的孝行图像。山东济南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祠堂刻绘有颍考叔、七女为父复仇等图像。^⑰山东莒县东莞汉墓石阙,墓主人孙熹,应为县主簿,石阙刻绘有颍考叔、七女为父复仇等图像。^⑱

刻于石阙、祠堂的孝行图,多出于良吏及其家族,具有较强的传播引导性,是循吏对孝行传播的另一种方式。而存于墓葬中的画像石孝行图,则可以说明孝行思想在汉代已成为人们认可的主要价值观念。如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墓室刻绘有鲁义妇图像。^⑲济南市长清区大柿园东汉画像石墓,墓室刻绘有曾母投杼图像。^⑳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墓室内刻绘有七女为父复仇图像。^㉑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墓室内绘有老莱子娱亲、闵子骞失捶、邢渠哺父、董永侍父、七女为父复仇等图像。^㉒

除了刻绘“孝子”图像外,“鸠杖敬老图像”和鸠杖亦是传播孝思想的重要载体,许多墓葬皆出土有手扶鸠杖的老人图像。如山东肥城栾镇村汉墓,墓主人应为县令或相仿等级,年代为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㉓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墓主人应为县令或相仿等级身份,年代为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㉔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墓主人应为列侯、郡太守,年代为东汉晚期。^㉕山东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画像石墓,墓主人应为武臣,年代为东汉灵帝末年、献帝初年。^㉖这些墓葬出土的画像石均有“鸠杖敬老图像”。

鸠杖和鸠杖图是敬老行为制度化、程序化、具象化的表现方式。《后汉书》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㉗《礼记·王制》载:“五十杖于家,六十杖

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㉘《史记·吴王濞列传》:“赐吴王几杖,老,不朝。”^㉙以当前出土实物鸠杖的材质来看,基本涵盖了“玉、金、银、铜、木等多种类型,包括19件铜质鸠杖和12件木质鸠杖”^㉚。如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先后出土了13根鸠杖^㉛。伴随鸠杖一同出土的还有维护鸠杖权威的汉代法律制度,比如武威旱滩坡东汉墓除了出土鸠杖之外,还有养老受王杖之制书以及数枚关于授受王杖的律令竹简。^㉜此外,考古人员相继在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小礁山北麓西汉霍贺墓^㉝,江苏连云港海州区西汉侍其繇墓^㉞,山东日照西十里堡村汉代墓地^㉟,广东省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㊱,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银山岭汉墓^㊲等墓葬中发现了鸠杖首或者鸠杖实物。

结合以上出土鸠杖及鸠杖敬老图像墓葬的初步观察,我们发现其墓主人以中小官吏居多,大部分墓葬主人或可看作具有汉代循吏特征的官员。此类墓葬,在其空间分布上,主要以山东和江苏、河南、安徽为主,而在河北、四川、内蒙古、甘肃、湖北、广西、广东等地也有类似墓葬建筑发现,说明孝思想的影响力和辐射面达到汉代所辖疆域,也可以说汉代循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对孝思想的传播。从孝思想传播过程与环节观察,上自天子、诸侯王、列侯,中及郡太守,下至县令、功曹等普通官吏,甚至豪强地主等社会各阶层皆能有意识地加以推行。

四、结语

通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研究,不难得出“汉代循吏以吏、亲、师合一的身份,将国家权力与乡里社会较好地连结起来”^㉚的论断,体现了循吏“主张为政宽厚仁德、反对威严苛酷的吏治思想”^㉛,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汉代循吏重视教化、行仁践德,对孝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东汉后期,孝道逐步成为一切人伦关系的准则,循吏在孝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努力推动是不能忽视的。

注释

①李雅雯:《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②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赵克尧:《论汉代的以孝治天下》,《复旦学报》1992年第3期。徐玲:《汉代孝治文化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李建业:《孝文化与汉代社会》,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朱岚:《中国传统孝道发

展史》，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 年。③本文所论之循吏，包括《史记》《汉书》之“循吏传”相关人物以及汉代能够较好遵循国家法度、推行国家政策的基层官吏。④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245 页。⑤任娟：《浅析〈诗经〉中的孝道思想及其表现方式》，《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 期。⑥陈小辉译注：《诗经译注》，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33—34 页。⑦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 年，第 58 页。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24 页。⑨李裕民：《殷周金文中的“孝”和孔丘“孝道”的反动本质》，《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 期。⑩安继民译注：《荀子》，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36 页。⑪杨天宇注：《礼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670 页。⑫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326 页。⑬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王启才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82 页。⑭刘剑：《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09 页。⑮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59 页。⑯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06—147 页。⑰敖承隆：《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 3 期。⑱刘修明：《两汉乡官“三老”浅探》，《文史哲》1984 年第 5 期。⑲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⑳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家庭》，《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㉑赵克尧：《论汉代的以孝治天下》，《复旦学报》1992 年第 3 期。㉒李珣：《汉朝“以孝治天下”管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 年增刊。㉓季乃礼：《论汉初的“孝治”》，《学术月刊》2000 年第 9 期。㉔徐卫民、裴蓓：《汉代孝文化研究》，《秦汉研究》（第六辑），2012 年，第 94—102 页。㉕王芳：《汉代孝伦理异化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9—19 页。㉖徐燕斌：《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与社会控制述略——基于媒介史的视角》，《现代传播》2017 年第 10 期。㉗㉘㉙㉚㉛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60、96、170、3623—3644、3631 页。㉜王子今：《汉武帝的察举：选官制度的革命》，《历史学习》2007 年第 4 期。㉝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13 页。㉞高晓军：《〈史记·循吏列传〉循吏形象考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 年第 4 期。㉟潘泉：《昭宣时期的循吏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36 页。㊱㊲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第 3317、2823 页。㊳㊴㊵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 年，

第 2467、2472、2480、3124 页。㊶㊷㊸杨笑菡：《东汉碑刻中的“循吏”书写》，《云梦学刊》2018 年第 5 期。㊹秦红卫：《山东莒县东莞汉墓石阙的画像艺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㊺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 年。㊻㊼洪适撰：《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5 年，第 74、73 页。㊽蒋英炬、杨爱国、信立祥、吴文祺：《孝堂山石祠》，文物出版社，2017 年；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 年第 1 期。㊾刘云涛：《山东莒县东莞汉墓出土画像石》，《文物》2005 年第 3 期。秦红卫：《山东莒县东莞汉墓石阙的画像艺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㊿周到、李京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 年第 6 期。㉀房道国：《济南市长清区大柿园东汉画像石墓》，《考古》2018 年第 4 期。㉁管恩洁、霍启明、尹世娟：《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东南文化》1999 年第 6 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 年第 1 期。㉃王思礼：《山东肥城汉画像石墓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4 期。㉄嘉兴地区文管会、海宁县博物馆：《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5 期。㉅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文物》1981 年第 10 期。㉆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编著：《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 年，图版第 23、28—35、48—60、76—77、80 页。㉇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325 页。㉈郭浩：《汉代王杖制度若干问题考辨》，《史学集刊》2008 年第 3 期。㉉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 年第 9 期。㊱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文物》1993 年第 10 期。㊲南京博物院、连云港市博物馆：《海州西汉霍贺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 年第 3 期。㊳南波：《江苏连云港市海州西汉侍其繇墓》，《考古》1975 年第 3 期。㊴何德亮、郑同修、崔圣宽：《日照海曲汉代墓地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世界》2003 年第 5 期。㊵袁春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陶鸠杖首刍议》，《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 年第 4 期。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汉墓》，《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㊷刘敏：《论汉代循吏群体产生的原因和影响》，《湖湘论坛》2014 年第 2 期。㊸李大明：《〈史记·循吏列传〉与历代正史〈循（良）吏传〉的设置》，《中华文化论坛》2013 年第 8 期。

责任编辑：何 参

A Study on the Role of Benevolent Officials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Spreading the Thought of Filial Piety

Wang Xiaohui

Han Guohe

Abstract: In the Han Dynasty, the concept of "governing the world with filial piety" was implemented. Most low-level officials tried their best to implement this policy, especially the officials with benevolent hearts contributed a lot in spreading the idea of filial piety. The benevolent officials firstly spread the policy by acting as an example, and then they established schools for spreading education and propaganda. The dissemination effect of the filial piety thought by the benevolent officials can be confirmed from the decorative images with the filial piety stories or the dove-stick figures in the tombs unearthed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Han Dynasty; benevolent officials; filial piety; filial piety thought